

朱起鳳撰

辭

通

開明書店印行

荀卿云名聞而實喻者之用也索而成文者
之繫也用繫俱得謂之知名是此者其非爾雅
乎以釋詁釋言舉者之用以釋訓舉者之繫自
是以降方言廣雅為近之說文玉篇字書也廣雅
韻古也皆舉用而止明人作駢雅蓋有言乎舉
繫者然局于雙聲疊韻諸聽語未能盡文之
索者也海字朱公丹九始作釋通以補前修之
詞凡兩字相屬載互續語者一切分韻次之文有
通借即附其次字有通訓者是為之按語續功
十餘歲草索四易者以十數者後著為定本信

乎其用力之勤也世人求繁名者多執清節者
為科律其書援引必以備顧問館閣諸生不復以
學諸異音同義者不能依類相系又不能有所辨
證若朱公之書方以類聚辨物尚名其度越約
而實越什佰故知學者之作與彙集典實以供人
據拾者用心深淺迥以別矣余未識朱公友人朱字奎
持書以來屬為題辭以是書為小學之屬與諸類
林不同蓋一歲始以其實竟乃題其為如右方氏圖

二十二年十一月章炳麟



序

十年前，我最初得見朱丹九先生的辭通，當時我就很佩服這部書，曾介紹它給一家書店。不幸這一部三百萬字的大著在那個時代竟尋不着一個敢冒險的出版者去承印。現在開明書店的幾位先生竟敢擔負這部大書的印行，他們要我寫一篇序，我如何敢推託呢？

向來編纂字典辭書的人，都把這件事看作「爲人」的工作。真能自己有創見的學者，往往輕視這一類的工作。到了清朝王念孫、段玉裁、錢繹諸人整理廣雅、說文、方言一類的古辭典，都只是自己做學問，還不是做字典。到阮元計畫的經籍纂詁，那才是有意爲後來學者做一部辭典，才是有意的「爲人」的工作。經籍纂詁雖然有「統長言短言而並錄，合本訓轉訓而俱收」的宣言，但全書所收，重在單字，詁訓來源，限於古籍。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成於上述諸書之後，其體例與方法都稍勝前人，體例是一部表示聲音與訓詁變遷滋生的字典，是一部有創見的辭書，方法是特別注重「轉注」與「假借」，用爲訓詁演變與形聲變異的原則。朱氏認假借有四例八用，四例是：

(1) 同音假借：如德之爲施。

(2) 聲韻假借：如冰之爲邇。

(3) 雙聲假借：如利之爲賴，答之爲對。

(4) 合音假借：如葦蕭爲菴，蒺藜爲茨。

假借的八用是：

(1) 同聲通寫：如氣作氣，謹用義，衛爲帥。

(2) 託名標幟：如戊癸。

(3) 單辭形況：如「率爾」幡然。

(4) 重言形況：如「朱朱」「關關」。

(5) 疊韻連語：如「窈窕」「蒙戎」。

(6) 雙聲連語：如「次且」「叢脞」。

(7) 助語之詞：如「能」「爲」「於」「焉」。

(8) 發聲之詞：如「乃」「若」。

右四例之中，疊韻、雙聲、合音都自然傾向於造成「連語」。八用之中，第七第八（助語與發聲之詞）都是有聲無字，其假借之字也都是「託名標幟」，故此二類實同於第二，而「託名標幟」其實又只是「同聲通寫」，故此四類單字的假借其實只是一大類而已。其餘四種用法，都是「連語」。在方法上，朱駿聲用假借（「依聲託字」爲假借）的原則來解釋連語，爲字典學上的一大進步。

朱丹九先生的辭通，在方法上，只是繼承說文通訓定聲的「連語」部分，專收連語，而用同聲假借的原則來整理他們，解釋他們。這是辭通的主要方法。例如：

彬彬（論語）

份份（說文）

斌斌（晉書衛恆傳）

分分（荀子儒效）「分分兮其有終始也」

斑斑（太玄經）

這是「重言形況字」的例子。如此排列，讀者自能明白這五種異文都只是一個連語的同聲假借。楊倞注荀子，把「分分」讀作「名分」之「分」，也只是因為他不懂得「分」字古音讀如「份」，即是彬字。又如：

續紛 郊盼

闔闔 續翻

翩翩 翩翩

翩翩 翩翩

頻繁 頻煩

便煩 便蕃

便番 便繁

這是「雙聲連語」的例子。（古音「紛」「番」等字皆讀重唇音，故「續紛」「便番」等等都是雙聲。）但本書指出，詩小雅采芣，「平平左右，亦是率從」，韓詩引作「便便左右」，左傳引作「便蕃左右」，漢書

司馬相如傳的「翻幡互經」，史記本傳作「翻幡」，那就又可見這一類雙聲連語與重言連語往往可以互相通寫了。

用聲音通假的原則來統馭許多不同形的字，這是近二百年來學者在方法上的最大貢獻。其實「政者正也」，「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禮者履也」，這種同聲相釋的方法本是古代哲人提倡過的。幾千年來，何以多數學者不敢發揮這種大聖賢提倡過的同聲互訓的方法呢？我想，這是因為這個方法，如果用的不謹慎，也可以產生許多可笑的謬論。例如董仲舒春秋繁露裏就常用這個方法：

「性」之名非「生」歟？

「心」之爲名「性」也。

「民」之號，取之「瞑」也。

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

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以上皆見「深察名號」篇）

這都不是從聲音通假上去尋求古訓詁，乃是從聲音上去傳會一些抽象名詞的意義。這個方法是很危險的。卽如「心」字，廣雅釋親說：

心，任也。

白虎通性情篇也說：

心之爲言任也，任于思也。

任的同音字很多，董仲舒卻單取那有禁制之義的「桎」字來解釋「心」字，說道：

桎，衆惡於內，弗使得發于外者，心也。心之爲名桎也。人之受桎苟無惡者，心何桎哉？

「任」字可作「任使」解，可作「信任」解，可作「擔負」解，每一義用來解「心」字都可以得着一個新的心的界說。如今排除衆說，獨取一個「桎」字，就把「心」的作用看成禁制衆惡，又因此成立性惡之說。這一個灣豈不是轉的太大了嗎？

大概古代學者有見於這個方法濫用的危險，所以不敢信任同聲互訓的方法。後來學者捨字音而取字形，這個方法的來源也很古。如董仲舒既說「王」字的聲訓有五科，卻又說「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這就又是用字形來作詁訓了。又如「士者事也」是聲訓；「聞一知十之謂士」就是形訓了。形訓的困難在於（一）象形之字太少，（二）後世所傳字形往往已是隸書以後的變形，已不是最初的字形了。所以拘執字形來求字義，勢必至於望形生義，鬧出王安石的字說的許多笑話。最大的弊病在於用後起的思想來推說最初造字的意義。如「通天地人」爲王，「聞一知十」爲士，都是後起的見解，決不可用來作最初的字義。

清朝的學者精研聲韻詁訓之學，知道「訓詁之旨本於聲音」（王引之經籍纂詁序），雖然不可傳會聲音去做那深奧的哲學名詞的根據，至少可以使我們懂得許多僻字生字的極平常的意義。例如楚辭：

小腹秀頸，若鮮卑只。

「鮮卑」是帶鉤。戰國策作「師比」，史記匈奴傳作「胥紕」，漢書匈奴傳作「犀毗」。若依字形，則爲四名，若依字聲，則是一物。此如「佛陀」又譯作「浮屠」，「由旬」或譯作「由巡」，「南無」又譯作「南謨」，本無其字，依聲借用，若拘執字形，就不通了。

朱丹九先生的這部書，羅列一切連語，遍舉異形的假借字，使學者因此可以得着古字同聲相假借的原則，使他們因此可以養成「以聲求義」的習慣。朱先生是一個有方法、有創見的學者，他著此書，不僅僅給了我們一部連語辭典而已，同時又給了我們許多訓詁學方法的教材。這是此書的最大功用。

「因聲求義」是辭通指示我們的最重要的方法。但朱先生在這書裏又指示我們一些附帶的校勘學方法。字形是容易錯誤的，寫的人可以有筆誤，鈔的人可以有眼誤，手誤，刻書或排印的人也可以有種種錯誤。讀書的人捧着誤書去笨想，就像韓非說的那個「舉燭」的笑話了。郢人要寫信給燕國的相國，晚上燭光不亮，他對那旁邊執燭的人說，「舉燭」！他嘴裏說「舉燭」，筆下也就誤寫了「舉燭」兩個字。燕相國接到來書，不懂這兩個誤寫的字是何意思，就勉強解說道：「舉燭者，尙明也。尙明也者，舉賢而任之。」他的話雖有理，究竟不是寫信人的本意。辭通所校勘的誤字，都可以使初學的人明瞭校勘之學可以幫助訓詁，都可以使他們學一點校勘的方法。例如「循」字與「脩」字，在古書裏往往互譌。辭通卷五，頁七八——八〇，三頁之中，就有許多例子：

伊循 誤作 伊修

吳循 誤作 吳脩

休循 誤作 休修

遵循 誤作 遵修

准循 誤作 推脩

述循 誤作 述修

又同卷頁五六有兩條很有趣的例子：

駢隣（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柏至靖侯許益以駢隣從。」）

駢隣（史記高祖功臣表：「柏至以駢隣從。」索隱：「駢隣，猶比隣也。」）

在這一條史記的誤「隣」爲「隣」，可用漢書來校改。下一條例子就不容易看出來了：

邑鄰（後漢書班昭傳：「聲譽曜于邑鄰。」）

邑隣（荀子解蔽：「不慕往，不閔來，無邑隣之心。」）

楊倞注荀子此語云：

邑隣，未詳。或曰，邑與悒同，悒快也。隣讀爲吝，惜也。言弃無益之事，更無悒快吝惜之心。此皆明不爲異端所蔽也。

朱丹九先生說此條云：

隣鄰古通用。「無邑鄰之心」者，言其謝絕往來，不與邑鄰交通也。楊注失之。

朱先生解說此句，也許還有可議之處。但他讀「邑隣」爲「邑鄰」，似乎遠勝舊說了。「鄰」是普通字，

寫者誤作「憐」，這是校勘學的問題，不當認為古字通假的一例。

這種「形似而誤」的例子，大多數還容易校勘。有時歷世久遠，異形之字自成一個古典，自成一個意義，那就不容易校改了。辭通卷六（頁二三）有：

藩垣（詩板：「价人維藩，大師維垣。」韓愈與邢尚書書：「今閣下爲君爪牙，爲國藩垣。」）

藩宣（韓詩外傳：「四國于藩，四方于宣。」）

蕃宣（詩崧高：「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舊五代史唐明宗紀：「世聯宗族，任重蕃宣。」）

鄭玄箋崧高篇說：「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朱丹九先生說：

蕃爲藩字之省，宣爲垣字之假。古讀亘字同宣。詩淇奥：「赫喧」，韓詩作「赫宣」，其明證也。于蕃于宣猶「維藩維垣」……

鄭氏釋「蕃」字不誤，讀「宣」爲宣暢之宣，則失之矣。

此處他用板詩的「价人維藩，大師維垣」來比較崧高詩的「四國于蕃，四方于宣」，這雖然是用一例來比一例，雖然只可稱爲「比例」的論證，其實也是一種「歸納」方法。王念孫用「終溫且惠」「終窶且貧」來比較「終風且暴」，就打倒「終風終日風也」的舊說，而建立「終」爲虛字（既風且暴）的新說。此種方法，同是比較個體的例子而求得一個通則；例子多，就是「歸納」；例子少，只可稱爲「例證」。其實在精神上都是歸納的方法。

朱先生以一個私人的精力，用三十多年的苦功，成此三百萬字的大書。書中雖不無細微可議之處，但他的方法是很可佩服的，很可效法的。十年前，他的同鄉學者王國維先生曾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

門提出「古文學中聯縣字之研究」一個題目，他說：

聯縣字，合二字而成一語，其實猶一字也。前人駢雅、別雅諸書，頗以義類部居聯縣字，然不以聲爲之綱領，其書蓋去類書無幾耳……若集此類之字，經之以聲，而緯之以義，以窮其變化，而觀其會通，豈徒爲文學之助，抑亦小學上未有之事業也。

朱先生此書，其中的一部分固然只可作「類書」之用，但其中有一大部分確是王國維先生所期望的「小學上未有之事業」，只可惜王先生不能爲他的同鄉學者的這部大著作一種最有權威的評判了！

廿三，三十三夜。胡適。

辭通序

十年前，我看見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五日）所載吳文祺先生的整理國故的利器——讀書通一文，知道海寧朱丹九先生著了這樣一部語言文字學空前的好書，歡喜贊嘆，不能自己，很希望早日得讀此書。本年，又看見國立北平圖書館：刊（第七卷第二号）所載吳先生的介紹朱丹九先生著辭通一文，知已改定今名，不久即將出版；此文較前文詳細得多，我看了以後，對於辭通的特色已經很明瞭了。本年一月十二日，吳先生來訪我，并以辭通排印樣本數卷見示，要我作序。我把它匆匆讀了一過，知道此書是把一個辭的種：異形都類聚在一起，說明某為某之音近假借，某為某之義同通用。（這類像曰本文中的「訓讀」字，錢竹汀稱為「義轉」，見潛研堂文集卷十五卷間十二。如詩文王借「躬」為「身」，湯漆象借「實」為「滿」，爾與豐象均借「用」為「又」，皆是。）某為某之字形

譌舛。又有本來是兩個解，因音近通寫而混淆難辨者，如「君臣」與「羣臣」意義不同，而「君臣」或作「羣臣」，「羣臣」或作「君臣」，（卷五，頁卅三）這類都把它們分開，一一加以詮釋。凡前人望文生訓的，此書修正了不少；前人「不知蓋關」的，此書改明了不少。書中對於前人精當之說固然採用，但朱先生自己的創獲實在非常之多，幾乎每條都有他獨到的見解；釋例中說：「有答賢所已發而加以闡述者，有獨中己見而自具機杼者，這兩句話說得家明白了。前代關於語言文字學的著作，創見家多的不過黃扶孟（生）的字詁與義府，方密之（以智）的通雅，王石曜（念孫）的廣雅疏證，朱允倩（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數書而已。朱先生的辭通，創見之多不亞於他們，茲且過之。」

我寫此序之前，已經讀了章太炎師、劉大白先生、胡適之先生的序。我覺得他們的序中已將此書佳處完全道出，現在把他們家扼要的話鈔在這兒。太炎師說：「若朱公之書，方以類聚，辨物當名，其度越韻府、奚翅什佰！」

故知學者之作，與舊集典實以供詞人攷拾者，用心深淺區以別矣。大白先生說，「鮮通固然是勤於鈔書，但是它底鈔書，是曾經把它用分析綜合的方法做成索引式的整理和統帳式的整理，已經兼有章氏（學誠）所謂專門之精和魚覽之博了。」適之先生說，「因聲求義是鮮通指示我們的最重要方法。但朱先生在這書裡又指示我們一些附帶的校勘學方法。」我以為鮮通還有一件特色，就是按語的簡潔，但求詮釋明白而已，不以繁徵博引為貴。前代學者如段茂堂（玉裁）之注說文，王石臞之疏廣雅，都是這樣。若桂未谷（馥）的說文解字義證，纂輯群言，發明甚少，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至於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的康熙字典與佩文韻府兩部書，則瞎湊杜撰，諸惡畢備，連鈔書都不會，離不通還很遠，而不學之徒竟驚其博瞻，奉為典要，甚至拾西人之唾餘，認那兩部劣書為中國辭類的寶庫，以為今後編纂辭典，當以那兩部劣書為主要之資料。若斯

之後，是決不會了解辭通的價值的。他們對於朱先生的創見也許要斥為武斷，對於辭通的按語的簡潔也許要誚為含糊呢！

我對於語言文字學上「辭形之歧異與統一」及「本字與假借字」這兩個問題，畧有管見，茲錄如左：

(一) 辭形之歧異與統一 中國文字，在造字時雖用象形、指事、會意、形聲之法，而至用字時，則全不管字中所表示的形與義，但把它看作標音的符號而已。凡同音的字，都可以作為某音的音符，凡讀此音的，隨便寫這些同音字中的哪一個都可以。試舉辭通中數字為例：如「炙」、「煤」亦作「埃」、「墨」(卷五，頁五至六。)是把「炙」、「埃」都作為「方」(這是我假定的古音讀法，下同。)的音符，「煤」、「墨」都作為「亡」的音符。(「煤」與「墨」有平入之異，「煤」在陰聲「怡」韻，「墨」在入聲「德」韻，音「亡」，「墨」在入聲「德」韻，音「亡」，「怡」陰入對轉，「墨」是「煤」之音近通用字。)孟、津亦作「盟」、「明」(卷五，頁五十九。)是把「孟」、「盟」、「明」都作為「亡」的音符。